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

——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施芸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关键词: 社区共育; 社会再生产; 抚育实践; 自然养育; 过程—事件分析

摘要: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2)01-0023-13

Shared Parenting as a Career: Crossing Family Boundaries in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Raising Children Together” in an Urban Community

SHI Yun-qi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communal care; social reproduction; practice of caring; natural caring;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event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practice of “raising children together” in urbanization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how childrearing can go once again across family boundaries when the very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given to families. Mothers’ private efforts to create social support for one another’s small families deprived of social resources in a strange urban setting have provided, on one hand, a basis for the rise of communal c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efforts have created for children a public life in which children together develop bonding and a shared communal identi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fforts lies in their potential to fill gaps in systems brought forth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 Behind the rising practice is women who try to find the linkage between their heavy burden of personalized childrearing and public life under the curr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hat is indicated by this study is the co-missing support 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of co-raising friendly space, the production of child-centred activ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raising culture. This practice has provided an imagination of a way to bring “society” back together with childrearing and enhanced an understanding about women’s subjectivity.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从“抱团养娃”说起

2021年暑假,一则“外地妈妈抱团养娃”^①的自

媒体文章得到了超过十万人次的阅读,《中国青年报》随之对此进行报道。文章通过大城市育儿中的

作者简介: 施芸卿(198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变迁、亲职与抚育实践、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

^①参见肖瑶《“共享”育儿新模式在上海兴起,W街道外地妈妈正在抱团养娃》,2021年8月23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 id=1708853776772493218&wfr=spider&for=pc。

孤独消耗感戳中努力扎根都市的年轻父母的内心,作为外来的城市新社会群体,如何在疏离的陌生人环境中重建社会连接?如何让孩子一走出家门就能在社区中找到玩伴?作为妈妈,又如何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不丢失自我?这些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的关键在于:当女性和家庭面对当前普遍沉重的抚育负担感到“独木难支”时,如何把“社会”重新带回日常抚育实践之中^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以“鸡娃”“内卷”等现象引发热议带来的抚育负担和教育焦虑,是我们前数十年效率至上的发展观,忽视社会结构和公共生活的城市化以及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发展的不均衡等情况在个人和家庭中的折射。一方面,转型后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①的过程,使抚育和照料成为私人领域承担的职责;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化深入、消费主义和西方育儿理念的影响,亲职履行标准被不断“精细化”且“层层加码”^②,加重了家庭的养育负担。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缺失,家庭可获得的外部支持很少,各种照料及教育的“外包”^③成为普遍地选择。遗憾的是,这仍是一条私人化的解决路径。这一情形背后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家对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职责的过度开发和汲取^④,而把“社会”带回抚育实践,正是希望重构儿童抚育中的各方职责分担,架设被私人化的照料职责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桥梁,找回整合的力量。

由此,借助/构筑社区力量育儿成为一种拓宽抚育公共支持的新的想象,并逐渐形成现实基础。当前,历经四十年社会发展和转型之后,中国从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小康社会,开启新时代的征程。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城市成为主要的生活环境。在“人民城市”“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导向下,在倡导三孩、鼓励生育、为承担抚幼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系统支持的政策导向下,“人”和“日常生活”正在更多地被看见。这一背景,为我们从理论、政策到实践重构儿童抚育中各方职责的分担提供了可能。本文即聚焦于上述报道中的案例,

进入其真实发生过程,来观察这一“以共同育儿为业”的社区互助抚育实验是如何在一个大城市的陌生人社区中被建构的。其背后的理论问题是: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共育基础被消解的当下,抚育实践何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儿童抚育中家庭、社会、国家、市场的各方职责是否有重塑的可能?

二、文献综述:城市背景下的社区共同抚育

正如很多研究指出的,养育从共同体集体承担,变为一家一户的责任,并没有很长的历史,这一过程是工业化以来伴随着工作与家庭的场所分离、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分工而出现的。但是,在这不长的历史中,伴随着“儿童”概念的出现及价值观变化、消费主义的渗透及阶层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的孩子”意识枯萎,养育共同体消解,这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现象^⑤。

就中国而言,随着现代化进程,儿童养育的职责边界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从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及亲缘群体共同养育,到集体化时期为使女性进入生产而设置的国家和集体分担,直至市场转型后重新回到家庭。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原有的共育基础被打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结构来说,城市化使人口流动增强,当前的城市社区规模较大且人员复杂,属于难以产生充满信任的“陌生人”社会;二是从空间规划来说,社区中缺乏公共空间,尤其缺乏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空间,缺乏互动交往的基础;三是从文化和观念来说,缺少乡土社会中的共育文化支撑,加之各种力量作用下的儿童价值提升、个性培养的理念,使得抚育越来越成为家庭私人领域内的事。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抚育是否可能更多地回到社区,并没有成为一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一方面,在抚育和照料职责“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尽管负担日益增长,但人们还是着眼于以家庭内部代际互助的方式解决,很少延伸到家庭之外去尝试和讨论;另一方面,在中国语境下,社区从一开始便更多地被作

^②参见施芸卿《重新发现儿童|“鸡娃”背后:从“外包”课外生活到社区互助育儿》,2021年6月1日,http://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2782864。

为行政意义上的“治区”^[7]发挥作用,缺少西方语境下“community”中原本具有的共同体的精神认同及公民自组织的含义,也因此难以在成员之间生发出较为深层的合作。换言之,儿童养育能否从“家庭”中走出来,于“私”于“公”都存在着看不见的界限。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党中央对社会建设的日益重视,以及社区营造具体方法的日渐成熟,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附近”成为一个热词。人们希望可以重建社区中的社会联系,使“附近”显现并且产生更为实质的互动。在此背景下,以社区为基础的亲子类活动策划甚至共同抚育的尝试,展现了以家庭为纽带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既契合了治理的内在需求,又在实践中孕育了使抚育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边界的可能。

(一) 社区共育: 探寻“协作培养”之外的可能

长期以来,有关教养方式的主流研究常将其视为阶层再生产的文化机制,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8]和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9]为代表,通过探讨家庭教育和学校文化是否一致,揭示表面平等的制度化选拔如何掩盖了家庭出身的平等。这一路径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底层—中产的二分框架也被质疑过于简单,无法展现教养理念的多样性^[10],没有充分关注到每一种养育方式的双面性,即每种养育逻辑都有内在的独特价值和负面影响^[11]。这两种声音都关注到了真实的儿童抚育实践中各主体与外部环境交织互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占据主流的中产“协作培养”模式并不特别关注家庭与社会公共性的连接,各家各户由孩子“被排满的时间表”支配的家庭生活,折射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为养育带来的种种分离和异化,给人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印象。因此,对抚育过程的分析,需要将更多家庭之外的要素重新带回来,以探讨另一种可能。

尚文鹏对美国波士顿新型“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群体的研究和安超对中国山东一个百年家族“民间养育”的研究,展现了这种努力。有趣的是,尽管两位学者面对的是美国/中国、现代/传统这两层截然不同的田野,并且从阶层来看研究对象位于精英(“在家上学”)和底层(“民间养育”)两个相

距甚远的端点,但两本书中多处可以体会到一种遥相呼应,即通过对养育和公共生活之间关联的强调,对“协作培养”的私人化特性予以反思。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理念上,带回“直觉”和“自然”。“在家上学”推崇“唤醒式”的教育,旨在把学生“内在的人”照亮,启发其自然。“民间养育”同样强调养育是关乎心灵的,是身体化、直觉性、情感性、道德性、传承性的,是在不同情形下的具体互动中实现的。二是在母职实践上,重塑养育者的主体性。“在家上学”构筑了穿越于家和外界的学习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在家教育”母亲的身份,弥合了母职和自我之间的割裂。“民间养育”则回溯了“自发性亲缘共育”,发掘底层主体的教育智慧和村落共育的现代价值。三是在抚育过程中,跨越家庭边界,连接公共领域。“在家上学”被作为一种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尝试性文化实践,在家庭内外构筑了丰富的共同体,挑战了西方话语中对于社会变迁的悲观论调。“民间养育”中由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则形成一种促进差异性理解的精神^{[10][P9, P21, P32#][11][P32, P80, P30]}。

上述三个层面都呈现出抚育对于跨越家庭边界的实质需求及其在实践中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让我们看到将身与心、亲与子、家庭与共同体、母亲的不同角色再度连续起来的必要和可能。这恰在实践的层面,自下而上地呼应了“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一理论致力于打破公—私之间的二元壁垒和对立,强调“社会再生产”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将“人的再生产”视为一种“生命的劳动”,包含所有社会联系所必需的生育抚育、家庭照料、社区营造等非市场性的情感和照料劳动^[5],倡导通过政策手段自上而下地调整抚育职责的各方分担。

富于启发的是,“社会再生产”为我们审视具体的养育方式提供了不同于“阶层再生产”的价值维度。从“人”和“生命”的角度出发,彼此的社会连接、情感支持与意义滋养就变得十分重要,而这无法在个体化的竞争中获得,只有在将公共性重新带回养育中才能实现。因此,在“阶层再生产”视角下被置于优劣两端的“协作培养”与“自然成就/民间养育”得到颠倒重置:前者以个体的专业成就为最高价

值,借用外包和协作的方式,更多地依赖市场而非社区,孩子和养育者都更可能面对时间、场所、社会关系、身心的分离,公共性较弱;后者则更可能采取互助的形式,孩子和养育者都嵌入共同体较深,社会整合带来的情感和意义价值显现,公共性较强。

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中呈现的社区共育,更接近乡村原有的“民间养育”,而非中产阶层主流的“协作培养”。它的养育目标更接近于培养“整全的人”而非单一的专业成就,养育过程更着力于形成亲子之间、抚育者之间以及养育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因此而重构了外来家庭在陌生人社区中的支持网络。这在当前“精细化育儿”压力下,对资源不足的群体(如外地妈妈)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不过,不同于“民间养育”中以亲缘群体为互助基础并有传统文化支撑的乡土社会,城市社区中的“共育”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积极建构的。换言之,这种人员、空间、资源的不断“整合”,是女性在抚育实践中通过不断将儿童抚育议题跨越家庭边界、寻找其与公共生活的连接,从而制造出来的。

(二) 女性主体性: 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

正如吴小英^[1]指出,现代化带来的“母职的悖论”在于,女性选择作为母亲和作为独立的人之间的两难。这不仅指女性所承担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更在于女性如何在社会所期待的母职和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之间达成自由选择。母职的困境植根于“生产与生活体制”的公私分离以及公共照料的缺席所导致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背后是女性和家庭以私人化的方式背负起公共的社会再生产责任。因此,解决的核心要义在于,要让母职走出私人化议题。回归社会公共性,但这仍是未解之题。深层的矛盾在于,在育儿方式日益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今天,生育和养育的母职实践本身何以能够超越私人化?

本文将这一问题带入具体生活场景,以“社区”为基点,探索抚育的母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家庭边界、得到公共支持的可能。这种可能首先基于如下客观条件:一是空间的可能,社区既是“家”的延伸,又是最小范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公”“私”之间过渡的合适范围;二是行动主体的可能,在当前抚育压力增大、工作“内卷”且意义缺失的情况下,

大城市社区中出现全职妈妈群体,她们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并在生育前有工作经验,有将日常生活的感受上升为公共议题的能力;三是外部支持的可能,这一方面是儿童抚育作为当前热点含有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是国家治理下沉到基层社区的实际需求,都给予了抚育议题公共性拓展的潜在对接点。但如何从可能变成现实?操作关键在于,女性如何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需要看到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生活与儿童抚育之间的连接。在此,要充分重视日常生活对于女性公共参与的意义。丁瑜^[2]指出,与男性不同,女性需要创造条件使其从日常杂务中“抽身”才能参与社会事务,同时希望从社会参与中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日常生活对于营造女性“社群感”并使之进一步转化为“社群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儿童抚育正是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是促使女性社群主体形成的良好基础。而基于应对城市中的抚育压力而产生的社会互助连接,既不同于乡土社会中先赋的亲缘基础,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推动的抚育公共化^[3]和社会化^[4];它有着更鲜明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属性,但较之西方社区中的自组织又更为复杂,受国家、市场等外部力量的形塑更多。

二是经济生产与儿童抚育之间的连接。在此,可及的、能兼顾生产与再生产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非常重要。母职的悖论植根于生产与再生产体制之间的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后者对前者的从属。在此,女性主体性体现为通过寻找其中的连接点和交叉领域,尽可能地重塑两者之间的关系,使自身在承担“母亲”和“工作者”两种角色时内在劳动节奏和文化逻辑较为统一,以便自己在两者间的转换更为从容。由此,一个能同时容纳女性的双重身份的时空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体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杨可^[5]对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历史回顾中指出,将丝业留在农村,可以让乡村女性生活和生产空间合一;而本文案例中的“以共同育儿为业”则充分利用了城市中丰富的人力资本,希望在妈妈们社区互助育儿的基础上延伸出专业化的部分,以连接儿童教育的消费市场,或者社会服务的政

府采购市场。

三是国家话语与儿童抚育之间的连接。在此,女性的主体性体现为将亲子、抚育议题向“上”拔高的自觉,使之与政策话语形成呼应。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在中国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中,其跨区域的公共性反而因国家介入而产生^[16],当前基层治理鼓励社会参与、城市建设提倡儿童友好、人口政策鼓励生育等政策背景,为抚育议题进入公共话语提供了潜在的连接点。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见,在当前条件下,要使被私人化的照料重新进入公共议题并不简单,背后是社会、市场、国家多条线索的交织和逻辑的并行,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变迁推进至当下的复杂性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的折射。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女性主体性的思路。行动者主体性关键在于以行动超越结构的可能^{[17][18]}。因此,从更广阔的意义,妈妈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儿童抚育在城市化背景下跨越家庭边界,这既是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语境下自下而上的探索,也是一种公私兼顾的努力:于“私”,妈妈们通过自身能动性,为资源不足的小家庭寻求更多的公共支持;于“公”,妈妈们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在末梢重新“黏合”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一种填满“‘新’的和‘旧’之间的河”^[19]的女性主体性,有着与男性公共参与非常不同的意义和力量。

三、案例与研究方法

W街道是上海市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对重视儿童教育的家庭有独特的吸引力。一是区域内有高校8所,其中著名院校4所,中小学12所。随着街区的各方联动,大学校园向外知识辐射增多,教育氛围浓厚。二是形成了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8个科技园区聚集了大量外来留沪的青年人才。这一流入城市、被称为“新社会阶层”的群体知识水平较高,又正值婚育黄金时期,大量的育儿需求促生了较为完善的相关服务链条。三是除高校和科技园区外,W街道辖区内还有驻地部队17个,各类金融机构28家,大小企事业单位3000多家,形成了丰富的街区空间生态。四是有鲜明的地标场所,街区中有一块2000平方米左右的“城市隙地”,在来

自T大学的专业社会组织SYC运营下变身为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个都市农园“C农园”,是一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社区花园的营造理念高度重视居民参与,并借助农园的生态场景积极开发以“自然教育”为核心的亲子活动,加之毗邻农园还有一条网红街提供商业便利,使这一区域成为上海喜闻乐见的“遛娃”场所。近年来,妇女儿童工作成为街道工作的重点之一,街道于2020年成功挂牌上海市“首批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吸引了更多“择邻而居”的家长。

S是开篇“抱团养娃”实验的首创者,她的先生即为周边高新技术园区就业的“新社会阶层”中的一员,S一家租住在与C农园一墙之隔的G社区。这是一个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有着明显的地理优势,周边配套成熟,菜场、学校、体育场馆、地铁、商场一应俱全,同时户型面积小、居住成本低,两相叠加使之有了极高的居住性价比,成为外来青年留沪打拼初期的“落脚”社区;但同时,硬币的另一面是小区内居民构成复杂,人际交往疏离。据居委会主任C介绍“小区总共1620户,500户是出租户,出租户里至少50%都是在写字楼上班的,另外50%可能是租给网红街餐饮店作员工宿舍用的。”(访谈材料:20200810)这鲜明地呈现出城市化带来的流动性。

S与先生2010年左右来到上海,初入社区的陌生感和邻里之间的疏离是大城市给S的最初冲击,抱着为孩子寻找玩伴的初心、兼顾“带娃”和“工作”的决心,S不断尝试,从营造自己的线上社群、参与社区及C农园的志愿工作,到发展出“社区妈妈团”并在此基础上创立民办非企业组织B。S的理想是,通过妈妈们的互助共育,在城市社区中重建小时候农村中那种熟悉的邻里关系,回归一种养育孩子的自然状态,并对这一模式进行总结,使之成为B组织能向其他社区输出的核心内容(包括如何培育发起者,如何与邻居、居委会、街道交流,如何为所在社区提供主题活动等)。

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S也由一名普通的“二胎妈妈”“社区志愿者”,成长为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如社区和街道的“睦邻达人”、“Y区最美家庭”、“Y

区最美读书人”以及市级“青年先锋培养对象”的先进典型,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 S 为代表的
新妈妈群体,构成社区生活中正在浮现的一个全新主体,她们有意愿且有能力尝试将儿童抚育与更宏
大的经济生产和公共生活连接,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她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及职场经历,但生了孩子
之后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辞职或者选择一种更自由的工作方式。这使她们很难完全认同单一的母
亲身份,仍希望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二是她们以外来留在大城市的“新社会阶层”为主,大
家庭不在身边,在地育儿支持少,且经济资源不充分,有房租、房贷等压力,因此社区在育儿支持
中的重要性凸显。三是她们兼具“草根群体”的灵活性和与正式制度对接的能力,有将日常生
活拔高使之专业化和公共化的能力,也为抚育议题向外寻求资源提供了可能。值得指出的是,
她们参与的最初动机可能只是为了解决儿童抚育和自我实现这两部分来自个人和家庭的基本需
求,而参与中不断探索方向、寻找资源的过程使其不断地打破抚育的家庭边界,进入社区及更
大的公共领域,成为实践中的“增量”。

因此,本文以实践社会学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尝试捕捉妈妈们不断使抚育议题跨越家庭
边界、整合区域内资源的过程,包含共育支持网络形成、共育友好空间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生产和
共育文化建构四个方面的努力。在资料收集上,笔者于 2020 年暑期进入田野,起初是为了以 C
农园为基点观察以亲子活动为特色的公共参与,在农园负责人 L 老师的介绍下认识 S 并了解
到“社区妈妈团”,随后决定聚焦于此。借助同为“妈妈”的身份,笔者带着孩子加入互助团
队并获得成员的信任,随孩子进

入各种活动实地参与观察。此外,笔者还与 S 及妈妈团的其他成员^③、社区书记和街道干
部、在地居民和社会组织等进行了多次交流,回溯了团队的发展过程。暑期调研后,田野工作
因疫情受阻,只能以微信与 S 和一些妈妈团成员保持联系,跟进最新进展。

值得指出的是,与一般案例不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案例自身的公共影响力在多方因素
的交织下逐渐显现,从而使材料除个人讲述外还包含很多公共叙述。事实上,2020 年暑期正
是这一尝试引发各界关注的初期。当时的传播出于种种原因:首先是 C 农园既有的影响力;
其次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们对如何重建邻里联系的关切;再次是 S 在任 C 农园主理人
期间策划了多场亲子主题活动。这些传播带来的影响力使笔者得以顺藤摸瓜关注到 S 及
其社团,但与此同时,包括笔者在内的更多外部力量的关注,又为案例后续的“抱团养娃”
实践引来了更多的媒体报道^④。因此,在当前抚育议题备受关注的氛围中以及新媒体极
强的话题捕捉和故事生产能力下,行动者、传播者、研究者及公众似乎被无法分割地连
在了一起。这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干预”^[15]的过程,为行动者提供
了更多向外连接的潜在可能及意义确认,也使研究本身带有一定的实践色彩。

四、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社会再生产”的家庭边界

(一) 打造“妈妈团”: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⑤

1. 建立线上社群

S 生于江苏农村,童年时父亲外出打工,长期不在身边。她喜爱读书,生育前在媒体行业
就职,有采

^③值得指出的是,“社区妈妈团”成员并不局限于 S 所在的 G 社区,而是以 C 农园为中心,扩展到周边数公里之内、步行或
电动车可及的社区。也就是说,在自然形成的网络中,对“社区”的理解已超出“治区”的边界,更看重理念的认同。参与
访谈的妈妈团成员有:家住 G 社区、育有一子一女的 S(曾从事媒体工作,目前全职,以“妈妈团”创业);家住 W 社区,育
有二子的 M(中学美术老师);家住 C 社区,育有一子的 H(曾创办公司,目前全职,计划教育创业);家住 D 社区,育有一
女的 J(外企法务总监、自然教育导师)。此外,调研期间,笔者还参与了 B 社团第一次理事会,除上述妈妈外,还有公众
号运营专人 Z、负责孩子课外竞赛的中学老师 L,以及国学和汉服爱好者 C 的参与。

^④如开篇提到的“真实故事计划”中对 S“抱团养娃”的报道,即从笔者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发表的文章中对“社区互助育
儿”的关注中找到的采访线索。

^⑤这部分为笔者根据与 S、C 农园负责人及 G 社区书记的数次访谈材料,并参阅其社区公众号相关内容整理(见访谈材料:
20200802、20200803、20200805、20200810、20200814)。

编工作经验。生育一胎时因身体原因辞去工作,尽管遭到娘家和婆家的反对,基于个人成长经历,她依然坚持两个信念:一是自己带孩子,而不是交给老人照看;二是认为女性不能放弃事业。因此,辞去工作后,她并不认同自己就是“全职妈妈”,而是将自己定义为“斜杠妈妈”,“斜杠”的意思就是“左手带娃,右手事业”,这成为她探索“以共同育儿为业”的起点。

妈妈们其实有两个关键的点:第一想要挣钱;第二想要带好孩子。左手带娃,右手事业,想要达到这个平衡。所以我就去探索,拿自己去探索。(访谈材料:20200803)

良好的文字能力和先生的互联网技术支持成为S创业的起点。2013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后,S开始学习心理咨询师课程,着手开设个人公众号,并经营自己的线上社群。社群以心理咨询、绘本共读为主题,以同样独立带娃的妈妈为主要受众,社群最多时有三十多个,群内的一些书本或课程的团购可以带来一些收入,但S认为,在当前城市中普遍有祖辈帮助的抚育环境下,社群更重要的作用是使她能遇见一批对“自己带娃”志同道合的妈妈,为她坚持自己的信念带来精神支持。尽管线上社群联系便利,但深度不够,一段时间后,S开始开展线下活动,以便寻找更多的沟通机会。

我当时就是一个“游击战”的妈妈,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网红街这边有非常多的培训机构,我就去跟培训机构谈,你们能不能把场地借给我。机构说“可以呀,你过来试试吧”。我就开始做“故事妈妈”,讲绘本,策划剪纸、捏泥塑等活动。后来发现效果不错,那些人也愿意把场地给我,也不需要我付费,而且我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些妈妈们,让她们进入我的群。(访谈材料:20200803)

此后两三年间,除线上社群外,S还通过此方式积累了大量做线下活动的经验,但机构、商家提供的免费空间在时间方面不够稳定,而周围可租用的空间又成本过高,成为阻碍其自营社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此时,街区内的C农园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带来的形势变化,为她提供了意外的机会。

2. 担任农园主理人

C农园与G社区一墙之隔,农园里有一个由旧

集装箱改造的空间,称为“小蓝屋”,日常由农园运营方SYC社会组织举办各类讲座和亲子活动,并接待各级参访。屋外是农园2000平方米的花草作物,日常养护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因此农园会招募一些周边社区的志愿者。S幼时有干农活的经验,便加入了居民志愿者队伍。2018年,农园开展社区夏令营,S又有线下活动策划经验,与SYC组织的联系进一步深入。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社会按部就班的生活,C农园是开放的都市空间,花草作物需要持续养护,而原有的专职主理人却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形下,S主动带领两个孩子承担了农园的日常维护工作。此前,SYC组织一直希望能找到较为稳定地参与农园日常工作的在地社区自治力量,S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合适的人选。经双方简单协商,S以志愿者的身份暂任农园主理人,在农园的官方对外宣传中,S被赋予了“社区互助会秘书长”的身份。她的职责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她可用小蓝屋作为固定空间策划、执行农园活动;另一方面,她需要每天去农园值班,负责整体环境的维护。

由于C农园是上海市乃至全国第一个以社区花园推动社区营造、居民自治的范例,社会影响力很大,这一平台给予了S意外的机会,使她以完全的“草根创业者”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其以“抱团养娃”为理念的共育支持网络得到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借助农园提供的空间和平台,S经营的妈妈群从线上走到线下。作为闻名的自然教育基地,C农园常常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同时,S作为主理人的职责之一也是结合农园特色策划活动,吸引附近家庭参加,这与其原有的妈妈社群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叠。这段时间中,S通过与每位来访者“不断地聊”,发掘出社区中有一技之长的妈妈,如绘画、烘焙、花艺、手账、故事等,形成了一批较为核心的共创成员。二是出于S在G社区的居民身份,由其策划的“种植课堂”“花园设计师”“端午识艾草”等农园特色亲子活动,在社区书记的支持下,与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活动结合,这使得社区内的居民加入活动组织、执行过程中,形成可以为S及其妈妈团提供外部支持的一张流动、隐形的网络。

对于S本人来说,除不断加强自身线下活动策

划、组织和执行能力外,在此期间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的向上、向外对接正式化、制度化资源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进入社区治理语境。在社区书记的支持下,S以居民个人的身份注册了一个社区公众号,记录社区生活,其围绕农园和社区策划的亲子活动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文字和图片成为真实、生动的居民参与的证明,契合自上而下的治理需求,也使S的组织、策划、写作能力被基层各部门发现并认可,使其逐渐非正式地参与到社区和街道的其他工作中。二是伴随着农园而来的有一些高级别的参观和接待工作,1-7月,S接待了来自团市委、统战部、团中央等各级有关领导以及各个大学、社会组织的参访者,这也在无形之中扩展了S的视野及其潜在的资源网络,推动其将共育事业从私人向公共跨越。

3. 正式成立民办非企业组织

随着后疫情生活的逐渐恢复,S感觉到小蓝屋外的花园养护压力过大,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胜任,遂于2020年8月向SYC组织请辞主理人一职,希望以活动策划者的角色与组织保持松散联系,并同时向G社区内部和街道寻找资源。此时的S已小有名气,除帮助社区策划党群活动外,恰逢W街道创建“儿童友好社区”,S承担了活动落地的工作,其与街道的关系进一步加强。S早年就有将妈妈团注册为正式民办非企业组织的想法,但直到2020年才获得了最重要的支持——街道愿意出面担任其主管单位。

我现在会为街道做很多义务的事情,但是他们会在义务的服务中让我链接很多资源,我就去谈合作,拉赞助。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居民,你再有能力,也很难去链接这些东西。但是你有实力的背后要先付出。政府需要做事的人呐。很多人给政府做事,可能会需要一些报酬,我一开始是没有要任何报酬去写一些东西,或者策划一些活动。但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链接到多方的资源,街道会感受到我的活动是踏实落地的,也愿意把这些资源主动地介绍给我。对我们的共创团来说,或者对我们今后的社区发展中心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昨天已经接到街道通知,他们做我的主管单位会去支持我们这个民非组织。(访谈材料:20200814)

同时,S将妈妈团在组织层面不断正式化,从中筛选出数位核心成员作为理事,涵盖美术/国学社团、课外竞赛辅导、外部资源连接、法律咨询、公众号运营、网站技术支持等不同专长。2020年10月,B社团获得批准,以“促进居民的参与感与志愿者精神,促进家庭不断参与社区自治和营造”为宗旨,以“丰富居民生活,挖掘社区达人,倡导社区共创,实现社区创生,提升公益意识,提高幸福指数”为愿景,是一个致力于“社区互助参与营造”的专业社会服务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妈妈团”被制度认可,成为在地“多元共治”力量中的一员。与此同时,S还着手市场语境下的品牌建设。在先生的帮助下,S制作了一个名为“斜杠妈妈联盟”的网站,希望做一个跨地区的斜杠女性推介平台,在“斜杠妈妈”宣言中,S表达了她对“妈妈”身份的反思和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为认同、建构相互支持的女性社群的理想。

成为妈妈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更多的身份和角色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社会如何定义女性?我们又如何定义自己?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妈妈,那我们自己又是谁?

我们是妈妈,又不止于妈妈!

斜杠妈妈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思维的突破,也是一种全新的自我发展策略,提倡开辟多种身份和多重收入的斜杠生活方式,主动寻求乐趣,深耕自己的技能,获得内心更丰盈的趣味人生!

从此,你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不管是家庭经营,还是斜杠视野,这都可以成为你的能量站,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监督,一起成为左手家庭、右手事业的幸福女人!

——“斜杠妈妈”宣言

纵观这段经历,S及其妈妈团经历了一个从自身和家庭的抚育需求出发,向外寻求支持、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于相似的抚育需求形成社会基础(线上社群、线下妈妈团);第二阶段,进一步向国家(自运营社区公众号,成立B社团)和市场(斜杠妈妈联盟)两个维度寻找资源、提升公共性。可见,妈妈团的打造,不仅仅是“寻找志同道合者”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女性在成为母亲后,重新定义自我、积累技能、寻求外部连接,重

设“抚育”这一议题在家庭、社会、国家、市场几方互动中的位置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在社区中探索“以共同抚育为业”的女性,也逐渐从家庭的私人生活中走出来,被卷入更大的社会结构下,交织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不同线索中,而她们的主体性也体现为她们从这一独特的结构位置出发,以抚育议题整合社区中的空间、活动和文化的实践。

(二)“家门口”的夏令营:共育友好空间营造

社区其实是一个大社区的概念,不仅是学校、商业、营区,其实资源是很多的,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但是你可以极致地利他,去梳理出一个整体的体系,让大家可以一起玩。(访谈材料:20200911)

G社区周边步行距离内,有不少可供儿童活动的场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商业类,G社区毗邻一条上海知名的网红街,稍远处则是W商圈,商业空间中有餐饮、书店、培训机构等,儿童亲和度较高,但有消费门槛。二是公共类,又分不同情况,如体育场、篮球场、小型展览馆、C农园户外空间等相对门槛低,受众不局限于在地居民,即到即用;而C农园室内空间则有一些特定用途,举办活动时才开放;此外,在当前基层社区建设加强的背景下,各个社区也建立了睦邻中心,开放给居民使用,但通常限于本社区居民,且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如各种兴趣小组等。因此,尽管儿童活动场所看似丰富,但很多时候是分散的,而且出于“属地管辖”的行政逻辑,常会出现地理上相邻的空间在行政上却分属不同社区、无法共同使用的情况,因此,实践中的空间并不充足。

这一情况在妈妈团策划的“自然共学营夏令营”中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在S及妈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在网红街的星巴克体验咖啡制作、在培训机构体验体能训练、借用餐馆的空间作为绘画课堂;在公园的篮球场热身、参观小型展览馆;在C农园种植、在G社区公共亭子中开展“穿汉服、唱国学”传统文化活动;在另一个社区的睦邻中心听建军节讲座并手绘墙面……而在另一个妈妈团与街道及专业社会组织合作、为创建“儿童友好街区”开展的“行走社区”活动中,组织者为孩子设计了一条G社区、C社区、网红街的行走路线,让孩子们随机就食物浪

费、家风建设、儿童安全设施、社区文明养宠等问题采访商家和路人,完成行走任务,并在街区咖啡馆进行回顾和复盘。

这些活动的背后是妈妈团成员们个人的努力,她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与各类空间所有者分别协商、达成合作。在此基础上,设计活动发挥“穿针引线”的功能,将街区内各类可供儿童使用的空间动态地黏合在一起。这从两个层面打破了空间使用中的原有边界:一是从普通空间到抚育空间,有了活动内容的填充,街区空间才变成“儿童的空间”,可以是商家(餐饮、机构、书店等),也可以是公共体育场馆、展览馆、绿地,甚至可以是整个街区本身带来的行走体验;二是从碎片空间到整合空间,随着“儿童友好”概念的普及和行政类的工作下沉,当前各社区都有不同的资源,妈妈们的沟通可以整合原本由行政边界分割的不同社区的资源,共享临近区域内的活动,将儿童活动范围内的可得空间都变成潜在的抚育空间,扩充了社会化抚育支持的多样性。

这种流动中的、实践式的共育空间生产,不仅使普通城市空间变成了“家门口”的育儿空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较之作为硬件的空间本身,更关注到“人”在其中的活动,使抚育者与儿童都与更真实的社会生活关联起来,滋养了在地生活及社会关系的厚度。在这些活动及其他工作的基础上,2020年,W街道成功挂牌上海市首批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建立了一张“1+1+2+7+32”的“一中心多站点”的官方儿童活动空间网络布局,这至少从行政层面体现出向着“大社区”整合的努力,为今后的探索创造了更多可能。

(三)“妈妈更懂孩子”:亲子活动内容生产

2020年,五个有效运转的主题社团,疫情下,正式主题活动120场,非正式溢出活动100多场,直接累积服务居民1965户,线上辐射5000+。基本所有活动都是靠众筹或资源链接,服务设计者和承担者都是优秀的各界女性。(B组织年度总结)

上述是S及其妈妈团成立的B社会组织在公众号上发布的年度总结。对一个“草根组织”来说,一年上百场的活动量可谓不少。那么,这一以“家庭”和“抚育”为核心、以“社区互助”为基本路径的探索

是如何做到特色内容生产的呢?这些活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活动,立足于各成员的专长,出于对社区中的真实生活需求的观察;第二类是与街道、社区及社会组织合作的活动,策划的创意从妈妈团的核心该如何匹配和衔接外部需求中生产出来。

对于独立带娃的职场父母,学校时间与工作时间的不衔接是个难题。妈妈团发现了这个需求,开设晚托班和暑托班,借用社区活动空间,在社区内部招生,收取少量成本费用,由成员们担任老师,形成“拼团养娃、混龄成长”的“爱心托管”模式。晚托班以“书法、绘画、英语、写作、数学思维”为内容,暑期班以“双语阅读、绘画手工、运动玩乐、游戏集美、午餐午睡、个性化学习”为一日安排,在互助基础上,也引入社团长期积累的一些外部资源。除此之外,周末和节假日,则会根据“斜杠妈妈”们的不同专长,开设绘画、烘焙、手账、花艺、汉服等专题课程。

“妈妈更懂妈妈,妈妈更懂孩子”是社区爱心托班的口号,传达的不仅是妈妈们的照料值得信任,还有妈妈们之间的守望相助,以及对于“想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的共识。除上述常见的学习和专题内容外,妈妈团实践中还有一类非常独特的活动:基于S及其同伴们对“孩子要‘接地气’地培养”的认同,把家庭、社区中的真实生活情境设计为让孩子们合作完成的小任务。例如,在暑期托管的某一天不安排午饭,而由孩子们大小混合,完成设计菜单、买菜、做饭、收拾的全过程;或是设计一场给一线社区工作者“送清凉”的活动,由孩子们分成小组,去超市买来绿豆,去农园辨认并采来薄荷,做成绿豆汤和薄荷茶慰问夏日里执勤的街区保安、清洁工、居委会成员等。这些活动都是商业机构中不常见的,带给了孩子在更为真实的社区生活的体验。

伴随着S逐渐进入基层政府的视野,第二类活动的生产结合了街道自上而下的需求。在此,妈妈团充分发挥了“草根组织”对接行政垂直体系时的灵活性,解决了街道购买外来的专业社会组织服务时无法对接到当地居民的难点。同样以街道创建儿童友好街区为例,街区地图是一个重要的考核点,但地图的制作成本很高,妇联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便提出要老干部工作中“关心下一代”内容结合来得

到经费补充,这就需要在活动策划时将孩子和老人进行黏合。为满足这个要求,妈妈团以绘画为主题,由M妈妈指导孩子们绘制团扇,随后由社区书记带领孩子们去看望孤老、赠送团扇,并将这一活动整合进前文所述的“行走社区·儿童议事厅”活动中,鼓励他们继续参加社区共同建设。对此,S的态度是:“我的核心永远是家庭,就是妈妈这个版块,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如果妈妈们可以满足,那我愿意。比如上次街道说我们要去看望孤寡老人,我说孤寡老人可不可以让孩子去看?他说当然可以,因为这些老人其实很想念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都不过来。你要把自己的核心和他们的需求有个匹配,策划一场有趣的活动,这是我在想的。”(访谈材料:20210321)

(四)“抱团养娃”:共育文化的建构

伴随着上述组织、空间、内容的生产过程,“抱团养娃”的共育理念也逐渐形成,可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父母看重亲自参与孩子成长的过程,而非高度依赖长辈或外包给机构。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知父母”(本科及以上)对教育本身的独到理解,重视“陪伴”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地留沪的小家庭没有足够的在地资源支持。

二是认同社区环境对于孩子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参与社区生活、结交同伴被提炼为一种“接地气的培养”,可以学到培训班里学不到的东西。这种共识背后的出发点可能多种多样。如绘画社的负责人M妈妈,因为儿子较为内向,学校生活又有很多限制,在社区中教孩子们画画的最初出发点是给儿子创造一个更容易和小伙伴互动的友好环境;而负责团队外部资源连接的H和常年投入自然导赏公益活动的J,则是当下兴起的“自然教育”的拥护者,认为“社区这个环境比较包容”,可以更多地“回归自然”“回归游戏”,“允许孩子自己去建设、发挥”;S自己则基于幼时在村庄中成长的经历,希望能“为孩子在高楼林立的环境中找回一处能亲近自然、结识朋友的场所”。

三是以共同育儿为业。“抱团养娃”的背后,是外地妈妈缺乏本地支持的现实困境,妈妈们以照料

的共享来积极应对,并在此过程中结成彼此深厚的姐妹情谊^⑥。但S的理想不止于此,在B组织被正式批准后,她不断地去学习社区营造、社会工作、社群运营等专业知识,致力于将“养娃”与“社区创生”连接起来。在她看来,这种以妈妈们为核心的社区力量与学校和商业机构都不同——既有妈妈们的初心,又有相对自由的空间——有上升为“事业”的基础“关键核心是什么?你不要为了做而做,一定要让这些孩子真的受益了……我就说这是妈妈们的力量、温柔的力量、爱的力量……斜杠妈妈就代表着一种精神吧,妈妈是核心,但是我们要有一点斜杠。”

(访谈材料:20200814)

这种不同,在M妈妈的画社中更充分地体现出来。M是一所民办初中的在职美术老师,但是学校教室有监控,课堂上不能让孩子们太活跃,而在社区的环境则自由许多。

在社区里我可以自由地跟孩子去互动,让氛围变得很活跃。我每次上课前先让孩子观察,然后去教,最后把你观察到的东西画出来……他们兴奋起来的话,就慢慢地拉回来。在学校里不敢让他们兴奋……时间也不规定死,不像机构,没画完就陪他们多画一会儿。收费也不收那么贵,就是让他们玩玩。

(访谈材料:20200805)

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以年轻妈妈们为核心的“抱团养娃”还进一步从家庭扩展到社区,逐渐形成在社区范围内重新整合的性别年龄分工,如摄影爷爷、故事奶奶、修理叔叔、运动爸爸、共创妈妈等。一场活动的落地,常常需要社区里“老中青”三代人全龄参与。同样以“儿童议事厅”系列活动为例,在煮绿豆汤为一线工作者“送清凉”的活动中,孩子们分为物料筹备组、制作组、派送组,需要实地去超市买水和绿豆、完成制作,并去社区办公室和街区派送,同时要配合电视台拍摄。操作中,每组都有志愿者妈妈的陪护;而作为本地人的故事奶奶,则非常细致地为孩子们规划了行进两个社区为街区环卫工人送爱心的时间和路线,甚至关注到了煮好的绿豆汤是

不是太烫,给社区工作者倒水时应该按什么顺序,并不断提醒记者该拍什么。在另一项社区儿童二手市集的活动中,场地需要大量的桌子和大型遮阳棚,社区中的叔叔们主动帮忙,去C农园搬来借用的工具,拉起活动的横幅。妈妈们则带着孩子们带来玩具、画好海报、摆出摊位。这些活动还得到了摄影爷爷的全程记录,为S后续撰写公众号文章提供了素材。2020年底,S被街道推选去参加全市的社区达人大赛,其海报上的参赛口号是“共创妈妈,服务社区;创造价值,回馈社区”。在此,妈妈团的经营理念进一步与更大范围的社区治理话语连接起来。

五、结论与讨论

“抱团养娃”的努力展现了一种使儿童抚育跨越家庭边界、基于自主的社会连接拓展公共抚育支持的可能。妈妈们的行动,不仅生产出了街区内处于流动和实践中的儿童友好空间,也使同处于照料短缺中的家庭得到了可及的社区互助网络支持,还以母亲和孩子的力量,重新定义了街区和社区,使之更为柔软而有温度。与此同时,这种从各家各户自身需求出发、自下而上生长的互助形式,也以其灵活性和多样性,为我们如何将“社会”带回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抚育需求拓展了想象力。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社区共育”的探索,在理念和实践上与当前大量讨论的中产主流“协作培养”非常不同。“协作培养”背后是教育市场化、亲职外包的深刻渗透,奔波在培训班的儿童和门外疲惫守候的父母背后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的、被“填满的时间表”异化而难以整合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社区共育”更像是一种回归,挖掘儿童成长的自然状态对于养育的积极价值,尝试邻里互助对于商业化的照料抚育的取代。由此,抚育不仅是儿童成长的过程,更是外来家庭在陌生人社区中支持网络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地资源的整合过程。因此,一个家门口的公共空间、一种可以兼顾生产与再生产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这也是“社区”这个维度的独特意义。

对于女性来说,“以育儿为业”传递出的信息

^⑥这一点让笔者在进入田野时深受触动,刚接触这个群体没有几日,妈妈们便很自然地让笔者把七岁的孩子放在孩子们中间,带着一起吃饭玩耍,以便笔者留出时间去访谈街道人员。

是:这是一种试图在经济生产与儿童抚育之间寻找连接点的努力。不同于两者在通常社会结构下被分置于“工作”和“家庭”两个分离的场所中,且运行着不同甚至相悖的逻辑,妈妈们构筑社区育儿共同体的努力,正是希望将两者在同一时空中尽可能地整合在一起。在打造“妈妈团”的尝试里,有女性对于“成为妈妈以后”如何“定义自己”进行反思,她们一方面拒绝了常见的代际合作育儿模式,把“亲自抚育”置于生活安排的中心,并努力提升照料的社会价值,使抚育的意义被更多地看见;另一方面,她们不认同完全放弃工作的全职妈妈,试图以各取所长、联合育儿的方式,丰富社区照料的多样性,提升社区照料的公共性,使之能成为一种能在小范围内提供的服务甚至产品,以便在社会价值之外进一步生产出经济价值、治理价值,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说,这种反思以向着推进社会再生产的努力为起点,但最终仍回到了以经济生产为中心,这颇具悖论意味,也显得不够彻底,但从本文立场来说,正是这种兼顾的努力,折射出中国的真实国情,是社会变迁中不得不“双肩挑”的妈妈^②在真实生活中的写照。

这种在与更大环境的互动中受到的制约与纠结,同样反映在这一“社区共育”模式的公共性拓展上。这一抚养和教育职责部分地走出家庭、走入社区的过程,受外界机会结构的极大形塑,并与可得的市场资源和被卷入的治理环境紧密互嵌在一起。这也是本案例与西方传统下的社区互助之间的最大区别。在此,基于各家需求产生的社会自发联系只是起点,其最终得以正式化和组织化是在不断回应自上而下的治理需求中实现的。换言之,若仅仅停留在“草根”互助的层面,它无法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也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公共性拓展被设置了限度,最终需要服务于政府的治理体系。此外,尽管一定程度上“共同育儿”的责任从家庭延伸至社区,但其当前仍主要由女性承担,且从单纯的照料劳动衍生出更多的如活动策划、人员组织、文字撰写等工

作,社区中的男性只提供些辅助支持。“社会”更多地体现在不同层面的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如不同角色分工的妈妈、同为女性的社区和街道干部以及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等。如何使这种公共性的拓展能够再度跨越性别边界,打破女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密关联,仍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可以说,从完全由民间自发的“草根组织”到在街道支持下正式成立的社会组织,“妈妈团”探索至今,已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但是,要使之持续运行,前路仍十分艰难。首先,重要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正式支持机制。尽管这一实践对于所在街区和普通参与者带来了良好的溢出效应,但大量的成本由核心成员个人承担,难以长期维持。每一场活动都需要前期策划、物料准备、人员联络、公众号文章撰写等工作,但成员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获得少量报酬,且仅限于与社区、街道合作的活动。尽管随着组织的正式成立,有日后获得项目资助的潜在可能,但目前还无法得到正式的支持。其次,全社会对照料劳动的价值认识仍有待提升,并且,公民意识和自治意识仍有待发展。妈妈团的愿景在于以基于家庭的“抱团互助”来重塑“共同体”的育儿氛围,并从中找到连接外部资源、创造经济价值的机会,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成员的加入。但是,在对照料价值认识不足和公民意识发展不够的情况下,为共育事业而先行付出的妈妈们,有时会被新来的成员当作另一种“保姆”,或被社会误认为是一种“共享育儿”模式中单方面照料服务的替代提供者,而这并不是这一实践的原意。

简言之,在当前全球照料危机下,这一“以共同育儿”为业的形式,以社区为基点,探索跨越家庭边界的照料资源整合方式,为女性作为“母亲”和“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寻找连接点,致力于为附着情感的私人化照料保留一席之地,同时弥合制度张力。这一尝试,不仅对于探索更具社会公共性的多主体协力育儿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体现了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 [1] 吴小英. 母职的悖论: 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1, (2).

(下转第 61 页)

- [7] [美]凯西·奥尼尔著,马青玲译. 算法霸权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8] Caroline Criado Perez. *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 [M]. New York City: Abrams Press, 2019.
- [9] Reinsch, R. W., Goltz, S. Big Data: Can the Attempt to be More Discriminating be More Discriminatory Instead [J]. *Louis ULJ*, 2016, (61).
- [10] Mainka, S. M. Algorithm-Based Recruiting Technology in the Workplace [J]. *Tex. A&M J. Prop. L.*, 2019, (5).
- [11] Cook, C., Diamond, R., Hall, J., et al.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the Gig Economy: Evidence from over a Million Rideshare Driver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 [12] Colin Lecher. How Amazon automatically Tracks and Fires Warehouse Workers for “Productivity” [EB/OL]. <https://www.theverge.com/2019/4/25/18516004/amazon-warehouse-fulfillment-centers-productivity-firing-terminations>.
- [13] 刘畅. 被算法监控的打工人 [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1-13/doc-ikftssan5519288.shtml>.
- [14] 斯涵涵. 智能坐垫岂可用来监控员工?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1-01/05/c_1126945977.htm.
- [15] Churchill, B., Craig, L. Gender in the Gig Economy: Men and Women Using Digital Platforms to Secure Work in Australia [J].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55(4).
- [16] Gupta, S., Langhans, S. D., Domisch, S., et al. Assessing Whe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Enabler or an Inhibitor of Sustainability at Indicator Level [J].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2021, (4).
- [17] De Stefano V. “Negotiating the Algorithm”: Auto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bor Protection [J]. *Comp. Lab. L. & Pol’y J.*, 2019, (41).
- [18] Mann, G., O’Neil C., Hiring Algorithms Are Not Neutral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6, (9).
- [19] Roth, A. Machine Testimony [J]. *Yale LJ*, 2016, (126).

责任编辑: 秉哲

(上接第 34 页)

- [2] 施芸卿. 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 [J]. *文化纵横*, 2018, (5).
- [3] [美]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朱钦芦译. 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 外包, 便捷背后的破坏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4] 陈映芳. 如何认识今天的家庭危机——国家—家庭关系的视角 [A]. *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 [G].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 [5] 李洁. 重新发现“再生产”: 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J]. *社会学研究*, 2021, (1).
- [6]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 我们的孩子: 危机中的美国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 [7] 沈原、李阿琳. 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8]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J. C. 帕斯隆著,邢克超译. 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9] [美]安妮特·拉鲁著,宋爽、张旭译. 不平等的童年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0] 尚文鹏. 在家上学: 美国中产家庭非主流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1] 安超. 拉扯大的孩子: 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12] 丁瑜. 妇女何以成为社群主体——以 G 市 L 村妇女自组织营造经验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 (4).
- [13] 翟菁. 集体化下的童年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2).
- [14] 徐明强、宋少鹏. 集体互助与妇女解放——北京地区街道托幼机构的兴起(1954—1957)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 (3).
- [15] 杨可.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劳动者技能形成——以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5).
- [16] 朱健刚. 国与家之间: 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7] [法]阿兰·图海纳著,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 行动者的归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8] 郭于华、沈原、陈鹏. 居住的政治: 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9] 沈原.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J]. *社会学家茶座*, 2006, (1).

责任编辑: 怀明